

凭窗读史

修身养性 砥砺德行

蔡元培组建北大“进德会”始末

1916年底,蔡元培先生以深受众望的道德文章和无出其右的人格魅力,出任北京大学校长。1918年初,为整饬校风,砥砺德行,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“进德会”,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纷纷响应,一时备受社会各界瞩目。

北大“进德会”的前身

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筹建进德会之前,其实有着较长时间的反复酝酿和尝试实践。

辛亥革命后,反对封建思想,铲除腐朽文化,在国内知识界风起云涌。1912年,蔡元培与张静江、张继、吴稚晖、李石曾等人开风气之先,在上海倡议成立进德会,旨在提高社会公众的伦理道德觉悟。“进德”一词出自《周易·乾卦》:“君子进德修业。忠信,所以进德也。”所谓“进德”,意指增进个人美德,通过锤炼个人的道德行为,树立新的社会风尚,潜移默化,影响他人,期冀达到提升全民道德修养及其水准的目的。5人中,除张继之外,其他4人都是当年巴黎进德会的原班人马。这5人均声名显赫,无一不具有振臂一呼的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。

彼时,进德会又称“八不会”,“八不”包括“当然进德”的“三不”:不邪邪、不赌博、不置妾,“自然进德”的“五不”:不作官吏、不作议员、不吸烟、不饮酒、不食肉。其中,“当然进德”是必须遵循的条例,“自然进德”则非强制约束,由人会人员根据自身情况和条件,进行自我约束。会员分为甲、乙、丙三等,甲等会员“持不赌、不嫖、不娶妾”三戒,乙等会员另加“不作官吏、不吸烟、不饮酒”三戒,丙等会员则再加“不作议员、不食肉”二戒。

蔡元培等人在上海筹建进德会的消息经报刊宣传后,引发各界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。“总统不一定孙先生来做,但社会风气的彻底改变,却是我等一定要去做的。”张静江的这番话,基本代表进德会“一切从我做起,致力改变社会”的宗旨。但也有人对进德会的“八不”戒律提出质疑,认为这些要求过于苛刻,且自相矛盾,比如“不作官吏”“不作议员”两点,彼时蔡元培系政府教育总长,张继则有入政议院的迹象。

1912年2月12日,溥仪宣布退位,第二天,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,推举袁世凯担任总统,但政府所在地仍在南京。18日,临时政府委任蔡元培为“迎袁”专使,汪精卫、宋教仁、魏宸组等8人为欢迎员,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赴南京就职。北上途中,蔡元培介绍了筹备进德会的相关情况。他后来回忆说:“舟中或提议进德会事,自李、汪二君外,同行者率皆当时之官吏或议员,群以官吏、议员两戒为不便。乃去此两戒,别组一会,即以同舟之三十余人发起,而宋遯初(宋教仁)君提议名为六不会,众赞成之。”

不久,蔡元培等根据这次“别组一会”的商议结果,筹备成立“社会改良会”,所列条例共36条,除“第一曰不狎妓”、“第二曰不置婢妾”、“第十九曰不赌博”等进德会的“六不”基本要求外,还增加了男女平等、婚姻自由;废除跪拜之礼,以鞠躬拱手代之;废除老爷之称,以先生代之;废除缠足穿耳敷脂粉之习;提倡心丧主义,废除居丧守制等条例。

民国肇始,内忧外患,时局动荡,1912年成立的进德会只是少数志同道合的道德约束者良好的愿望和预期,带有浓厚个体色彩的自我追求和信念理想,由于发动面窄,参与人数少,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约,并未产生很大影响,最终半途夭折,不了了之。然而,对于肇路监禁致力于提高国民素质、改良社会风气的蔡元培而言,进德会却在他心底播下了发酵的种子。



1908年,留德时期的蔡元培。

开启一扇自我淬炼的大门

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,非常重视教职员和学生品行修养及道德建设。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,其生源构成相当复杂,既有通过正常入学考试录取的学生,也有各种形形色色的大人老爷,还有不少纨绔子弟,其中刻苦学习者有之,嫖赌博者有之,浑浑噩噩者也有之。对此,蔡元培著文表示:“鄙人归国以后,先至江浙各省,见夫教育实业各界凡崭露头角者,几无不以嫖赌为应酬之具,心窃伤之。比抵北京,此风尤甚,尤可骇者”,“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,分子之腐败,不能无影响于全体,如疾疫然,其传染之广,往往出人意料”,“私德不修,祸及社会。”因此,他极力倡言“进德”,坚决抵制买官卖官、赌博嫖娼、挥霍公款等社会腐朽现象,不遗余力地与社会浊流作斗争。

一年后,蔡元培制定的各项改革举措在北大次第推进,组建进德会亦随之提上议事日程。1918年1月19日,蔡元培起草的《北京大学之进德会旨趣书》刊登在《北京大学日刊》第49号上,开宗明义地提出组织进德会意在增进个人道德品质,担负起改良社会风气、与俗流作斗争的神圣职责。

“旨趣书”明确了进德会甲、乙、丙种三个等级的会员条件。其中规定:“甲种会员,不嫖、不赌、不娶妾;乙种会员,于前三戒外,加不作官吏、不作议员二戒;丙种会员,于前五戒外,加不吸烟、不饮酒、不食肉三戒。”进德会的人会手续较为简单,会员只须填写一份申请表,申报为某种会员后,公诸《北京大学日刊》。申请人者若先前有违犯戒律行为,只要以后不犯,则不予追究,仍可入会。这种不咎既往的原则,给一些有过违犯行为而又希望择善而从者,开启了一扇自我淬炼的大门。此外,“旨趣书”还公告,进德会成立后,将公定罚章,推定纠察员若干人,对违章者执行处罚。

“旨趣书”发布后,北大教师、职员、学生纷纷响应,踊跃递交入会申请书。截至5月底,有469人报名参加入会,占全校人数的四分之一。许多知名教授竞相加入,如甲种会员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许德珩、沈尹默、章士钊、马寅初、马叙伦、罗家伦、周炳琳、朱家骅、胡适、王宠惠、张国焘、辜鸿铭等;乙种会员蔡元培、范文澜、傅斯年、钱玄同、周作人、徐宝璜、康白情等;丙种会员梁漱溟、李石曾等。

“进德会”的严厉戒律

5月28日下午4时,北大进德会召开成立大会,蔡元培亲自担任主持、发表演讲,并当选为会长。进德会成立后,各地新闻媒体纷纷予以报道,而且在海外也引起了极大关注。

6月1日,进德会选举评议员和纠察员。6月29日,进德会召开的评议员、纠察员会议通过决议:废除原定甲乙丙等级,以不嫖、不赌、不纳妾三条为入会的必要条件,其余五条戒律,由会员自由认

同承诺遵守;会员中若有违反所认戒律者,经劝告后仍犯,由会员10人签名报告,经纠察员调查属实,召开评议会宣告除名。

7月6号,蔡元培以会长名义发布《进德会启事(第四号)》,重申遵守戒律是加入进德会的必需条件,“进德之名非谓能守会规即为有德。德者积极进行之事,而本会条件皆消极之事,非即以为德,乃谓人德者当有此戒律。”为此,“启事”公布了八条戒律的界说,作为进德会实施的具体办法。

“陈独秀风波”的激烈交锋

北大进德会在蔡元培的悉心领导下,会员遵守戒律,严以律己,在提高道德水准、匡正腐朽风气方面,取得了显著成效。蔡元培自己身体力行,成为公认的模范会员。此外,进德会的首创者、北大教授李石曾,不管是参加巴黎、上海还是北大的进德会,都是丙级会员,他一生不吃肉,不喝酒,对自己的要求苛刻至极,被称为彻底的“素食主义者”。萧瑜在《李石老之物质生活》中对他简朴的生活曾描述道:“李石老精神生活重于物质生活”,“喜欢朴素,而厌繁华”,“其所持原理,为尽‘最大’之可能,取‘最少’之所需”。

然而,也有例外。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特立独行,卓尔不群,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、新文化运动的旗手,在新旧思想的激烈交锋中,一马当先,狂飙突进,蔡元培对他倚重有加,曾联手对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,因而招致守旧势力的忌恨和诋毁。进德会成立后,陈独秀以152票当选为评议员,可他名高责重,却违反了戒律,遭人举报,且告发者不止一人,都是竭力反对新文化的重量级旧派人物。

守旧派借道德之名,行泄个人私愤之实,对陈独秀的持续发难和攻击,让蔡元培倍感棘手。按规定,进德会会员违犯戒律,将会受到相应处罚。蔡元培在写给守旧派代表林纾的公开信中,替陈独秀解围说:“对于教员,以学诣为主,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(学术自由、兼容并包)为界限,其在校外之言动,悉听自由,本校从不过问,亦不能代负责任。例如复辟主义,民国所排斥也,本校教员中有抱持复辟论者,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,与政治无涉,则听之。筹安会之发起人,清议所指罪人者也,本校教员中有其人,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,与政治无涉,则听之。嫖赌娶妾等事,本校进德会所戒也,教员中间有著作侧艳之诗词,以纳妾挟妓为韵事,以赌为消遣者,苟其课业不荒,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,则姑听之。夫人才至为难得,若求全责备,则学校殆难成立。且公私之间,自有天然界限。”

但是,反对派不愿善罢甘休。在巨大压力下,蔡元培不得已已在1919年3月26日晚,召集北大教授马寅初、沈尹默赴汤尔和家开会,商议如何处理陈独秀“违戒”事项。沈、汤力斥陈独秀私德不修,缺乏检点,难以为人师表,尽管蔡元培全力维护,然而身为进德会的首倡者,最终他不得不同意沈尹默和汤尔和的提议,决定召开北大文理两科各教授会主任会议,共同研讨陈独秀的去留问题,同时研究北大内部体制改革事项。

4月8日,在蔡元培的主导下,教授会主任会议议决提前实施《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》,合并文理两科,不设学长,新设教务长。选举经济教授会主任马寅初为教务长,行使原文理两科学长职权,并报备教育部。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,就予以剥夺,且不露痕迹地得以顺利解除。虽然陈独秀实质是被撤销了职务,但蔡元培避免了面对守旧派穷追不舍的尴尬处境。不过仅此一点,也足可见蔡元培先生做人的宽厚,以及卓越的领导能力。

周惠斌



闻一多1938年2月参加“湘黔滇步行行团”时画于沿途的写生作品。

闻一多:

至真至纯 良善同行

提及闻一多,那个拍案而起、怒发冲冠的爱民主战士形象跃然眼前。论为人,金剛怒目、铮铮铁骨、热情似火的诗人闻一多,已经成为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伟岸形象。论为文,《红烛》之炽热,《死水》之深沉,都是文学史上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。回望闻一多的一生,至真至纯、良善同行是他生命的熠熠底色,也是他为人文的可贵美德。

“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石上建设新的房屋”

闻一多早期部分诗作被收入在《真我集》,虽不如《红烛》《死水》两部诗集那么引人注目,但青年闻一多的志向与品格已在其中显露端倪。

写于1921年的《率真》有如下诗句:“鸛儿,你唱得这么高兴?/你知道树下靠着一人是为甚的吗?/鸛儿,你也唱得这么高兴,/你未曾听见诅骂的声音吗?/好鸟儿!我想你们只知道有了歌儿就该唱,/什么赞美,什么诅骂,你们怎能管得着?/噢,鸛哥,鸟族的不肖之子,/忘了自己的歌儿学人语,/若是天下鸟儿都似你,/世界上哪里去找音乐呢?”不论是鸛儿的赞美,还是鸛儿的诅骂,有了歌儿就该唱,发出真我的声音,而不是鸛哥学舌般丧失了真我。这就是受过“五四”精神洗礼的青年闻一多,不仅涵养“自我”之独立精神,而且还虔诚地追求“真我”之品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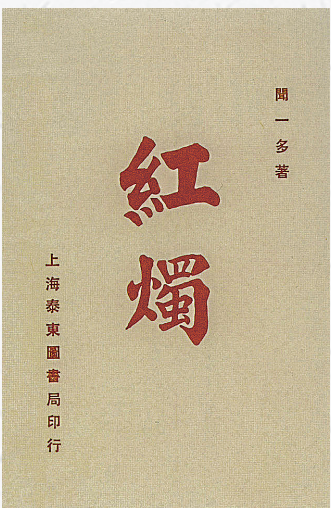
《红烛》开篇,他就发出诘问:“红烛啊!/这样红的烛!/诗人啊!/吐出你的心来比比,/可是一般颜色?”当时一些诗人标榜为艺术而艺术,同为诗人的闻一多,却勇于质疑诗者们能否真如红烛般,存有表里如一的“真我”?显然,闻一多的诗就是“真我”的诗意表现和率真表达,内在与外在统一于“真”。

另外,在文学批评实践中,闻一多不为亲疏利害关系所困,无论赞扬或批评,皆出于率真之心。作为清华文学社的重要成员,他努力倡导并营造良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氛围,有力促进学生社团的良性发展。当时仍是在校学生的闻一多,按说需要郭沫若这样已经有一定名望的诗人为提携,以求在文学界获得更多的机会。为了共同的利益,他们彼此褒贬更可以壮大声势。但闻一多该赞扬的赞扬,该批评的批评,努力践行一个批评家的职责,于是就有了《〈女神〉之时代精神》和《〈女神〉之地方色彩》。闻一多赞扬郭诗不独艺术上与旧诗词大相径庭,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”,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《女神》存在欧化的问题,地方色彩不够明显。他写道:“我们只能够并且应当在旧的基石上建设新的房屋。”百年前,闻一多率意直言郭诗的缺憾,不因其是自己的“盟友”而屈心抑志。该赞扬的赞扬绝不掺杂,该批评的批评亦不掺杂。

“美即是真,真即美”

闻一多深信“真”是沟通文学和美的通途,他的诗歌创作实践融入了真实的生命感受和诗学思考,是他真切的诗思洋溢。在诗歌《艺术底忠臣》里,闻一多真诚地表达了对美国诗人济慈诗品、人品、的认同。他认为济慈不同于那些“名臣”,而是艺术的“忠臣”,济慈的诗学重心就是对“真”的坚守,“诗人底诗人啊!/满朝底冠盖只算得/些艺术底名臣,/只有你一人是个忠臣。/‘美即是真,真即美。’……”

这既是闻一多对济慈的真诚追慕,又暗含着他自己的艺术理想。回闻一多丰富的诗歌创作,他的诗中处处履行着“美即是真,真即美”的诗学信条,洋溢着“真”的感情。这种“真”,是诗人对爱女、亲情等小我情愫的真心流露,也是诗人对国家、民族、人民等大我情怀的真切抒发。朱自清就赞誉闻一多“是当时新诗作家中唯一的爱国诗人”,想必是看到他诗歌作



《红烛》书封。

品中的“真情”。

留美期间,由于祖国实力弱小而屡遭冷眼的经历,时刻牵引着闻一多敏感的爱国主义心绪。在《太阳吟》中,他写道,“太阳啊,刺得我心痛的太阳!/又逼走了游子底一出还乡梦,/又加他十二个时辰底九曲回肠!”日夜牵系家国的游子形象呼之欲出。《洗衣歌》中,他写道,“年去年来一滴思乡的泪,/半夜三更一盏洗衣的灯……”简单的诗句,生动展现了客美华人的思乡情结。《七子之歌(澳门)》中,他以孩子对母亲的情感,比喻自己对祖国的深深眷恋,“你可知,‘妈港’不是我的真名姓?/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,母亲!/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,/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。/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!/请叫我的乳名,/叫我一声‘澳门’!/母亲!我要回来,母亲!”

行走世界各地,闻一多始终牢记自己的“真名姓”,爱国之心炽热、浓烈。在《我是中国人》里,他自豪地宣称:“我们的历史可以歌唱。”在《一句话》中,他始终期待着“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,/爆一声:‘咱们的中国!’”赤子之心,如真金在熊熊烈火中熔炼。

爱女的离世,对于闻一多而言是生命体验中漫长的灰暗与潮湿。这种真切的痛感刺着他的内心,借助诗意笔墨自然流露出来。葬歌《也许》没有大开大合、悲感迸裂的情感喷发,而是通过一位父亲向爱女日常呢喃的耳语,将无尽的惦念、爱抚情愫缓缓地释放,真实感人。“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,/也许,也许你要睡一睡,/那么叫夜鹰不要咳嗽,/蛙不要号,蝙蝠不要飞……”这位父亲,以想象爱女人眠的美好状态置换死亡,也许女儿在听蚯蚓翻泥、小草根须吸水,这场景可能比人世更加静美,要比“那咒骂的人声更美”。这般以乐景写哀情,使人更感其哀。《忘掉她》连诗形都浸润着闻一多的哀情。“忘掉她,象一朵忘掉的花”复查出现,视觉组合形式类似小小的棺槨。在诗意表达上,闻一多将爱女比作“一朵忘掉的花”,这花开得很偶然、短暂,安眠地下的她听蟋蟀鸣、看墓草长,“她已经忘记了你,/她什么都记不起”,诗人自我安慰“就说没有那个人”“象春梦里一出梦,/象梦里的一声钟”。书面语言层面重复出现的“忘掉她”,心灵旋律层面无法做到的“忘掉她”,这种矛盾的表达,反映出的正是一个父亲纠结的真实内心。

品读闻一多的抒情诗,没有丝毫的拿腔拿调之感。贵在真实,特别是情感的真实,这是闻一多贯彻始终的艺术信条。诗坛有一些诗作拿腔作势、空洞无物、感情虚浮,归根结底是因为诗人没有将“真”的诗思、诗心、诗情融入。不真何以言美?闻一多的诗歌情感真挚、语言质朴、直击人心,让人们感受到真、善、美的力量。“真”既是闻一多的人格底蕴,也是他的艺术底色。

“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,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”

如果说真与美是闻一多的艺术观,那

么真与善则是闻一多的人生观。始于真,终于善,他既是爱国民主斗士,又是现代经典诗人。闻一多的人格魅力在中国现代文学界是少有的。当看多了高蹈派、伪善派背后语言文字和真实人品的巨大差距,也就对至真至纯、表里如一、身正为范、大爱真善的诗人闻一多感到由衷的钦佩。

纸面或口头的真与善,标榜者甚多,但能以生命践行的屈指可数,闻一多就是其中之一。在生活中,他也是求真与向善的典范。少年时接受新教育、新思想的闻一多,自然也有着自由恋爱、自主婚姻、性别平等的现代思想。然而在1922年即将赴美留学之际,他被父母包办婚事,无奈与高孝贞步入婚姻。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流露出“我将以诗为文,以画为子”的绝望心绪。在现代文学史上,被传统包办婚姻所困而又另觅佳音的名人很多,能在包办婚姻中友善对待另一方的却不多。闻一多也曾痛苦、迷茫,但他站在高孝贞的角度反思,这样一位不识字、被父母包办的女性同样是受害者。这种“善意”让闻一多不忍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妻子的痛苦上,他决心培养这段感情。于是,在他的勉励和支持下,高孝贞开始接受教育,夫妇二人共同培植情感。在这过程中二人感情日渐醇厚,旅美的闻一多,甚至因为思念高孝贞写下著名的情诗《红豆》组诗。

当然,人非草木,目睹耳闻其他人追求自由恋爱,难免有情绪上的波动,在传统伦理观和现代爱情观之间,他也有过矛盾和纠结。这恰恰是真实的人性反应。没有感情基础的包办婚姻让人痛苦,自由恋爱的现代爱情让人甜蜜,但对于前者,闻一多没有轻言舍弃,他选择的是将传统的婚姻改造为现代的爱情。他以自律、自省的方式,及时掐灭一些不好的苗头,调整自己的心绪,表现出超强的自制力。闻一多曾说:“一个人要善于培植感情,无论是夫妇、兄弟、朋友、子女,经过曲折的人生培养出来的感情,才是永远回味无穷的。”这也是他对自己婚姻和爱情的亲身体会。在闻一多的善意中,高孝贞从伴侣逐渐成为他的同志。他牺牲后,高孝贞改名高真,想必是对患难真情的纪念吧。

回首闻一多的人生之路和艺术之路,真善美在他身上是统一的。他践行的“求真”诗学观和率真的抒情人格,与鲁迅倡导的“率真行诚,无所掩饰”的摩罗诗人的现代精神相一致,与传统的抒情有不小的差异。这种求真的抒情,在《发现》《祈祷》《一句话》《洗衣歌》里像团火向外灼烧,一个胸怀宽广、心忧天下的青年诗人无所顾忌地袒露心声。这种求真的抒情,敢于对自身进行批评和剖析,比如《玄思》中写道,“我这荒凉的脑子/在昏昏沉沉底默里,/常进出些古怪的思想,/仿佛同些蝙蝠一样”。不论外向度的批判现实式抒情,还是内向度的反思自省式抒情,都具有向着真理求索的现代品格,富有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。

闻一多的理想主义是建立在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立场上,追求真理与正义。他的“新格律”诗学不是为了开宗立派,而是真诚地为现代诗歌发展摸索一条适合自身的道路。闻一多面对新诗欧化存在“乱跳乱舞游戏于纸墨之间”的弊病,倡导诗的真价值、真精神。他对于真美一体的理念内核的推崇,实际上反映出他“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产儿”的诗学理想。

不论是诗,还是为人,求真、自省的态度,决定了他具有因真而美、因真而善的艺术风范和人格魅力。诚如学者王泽龙所言,闻一多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符号和人格标杆。浪漫主义现代诗学品格,是闻一多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现代诗学遗产。

王雪松